

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

张广智

在世界历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西方古典史学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并逐渐蕴育了诸多优良的传统,对西方也对世界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世以来,西学东渐,但迄至19世纪末,中西史学才日渐互通讯息,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涵化^①的历史进程。寻求一个时期(或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史学对他国史学发生交互影响的事实联系,透析中西史学文化之间的沟通与回应(引进过来,反馈回去),这不仅是比较史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对我们继续引进与借鉴西方史学富有现实的意义。本文旨在略说西方古典史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侧重透视它在现代中国,尤其是我国新时期以来所激起的回响,并由此而生发出若干思考。

关于西方古典史学,广义地说,通常指的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史学,它是西方史学的母体和发祥地;透视色彩斑斓的西方近现代史学,人们随时可从古典史学的图景中寻觅到它们的原生形态和历史源流。

西方古典史学肇始于古希腊的神话与史诗,尤其是发端于著名的“荷马史诗”中。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西岸的爱奥尼亚诸城邦的“散文史家”出世,他们力图用散文的形式写成一种与历史真实相符的作品,实为西方古典史学诞生的前奏。西方史学走出它的“童年时代”,得归功于“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努力,他的史学开创了西方史学的一个新时代,也标志着西方古典史学的莫立。

从“史学之父”诞生,古希腊史学迅速出现了像修昔底德、波里比阿等这样一些世界级的大史家,他们的史学成就站在了当时世界史学的前沿。罗马人在军事上征服希腊的同时,也继承了古希腊的史学传统,所以,古罗马史学大体是沿着古希腊史学的道路前进的,但在塔西陀、李维等史家那里也有新的建树,显示了古典史学在罗马时代所能获得的新水平。倘若给西方古典史学在时间上作一个界定,它大体上起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的时代,下迄公元5世纪古典世界的倾复,其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这之

^① “涵化”一词可以有很宽泛的含义,在各个学科领域中也有更具体的内容。本文所指的“涵化”,泛指中西史学之间的沟通与回应。

后,圣·奥古斯丁的神学史观支配了西欧的中世纪史学的发展进程,直至14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史学的兴起,西方古典史学得到了“复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了近现代西方史学的新篇章。

西方古典史学在这一千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日渐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概言之,这种传统可以列举如下几点:

1. 求真探索精神

我以为,立意求真,竭诚探索,试图揭示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这是西方古典史学传统的核心。希罗多德的《历史》虽不无舛误,但他的求真与批判的精神还是超越了他的时代。修昔底德更被后世史家视为一个“求真的人”,这里我们不妨引证一段不知被多少学者们引用过的著名论断:“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段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①在这里,他在西方史学史上首先提出了史料批判的方法。唯其对史料采取这种严格的考订与辨伪的科学方法,并进而在历史表象后面寻求更为深刻的内在原因,使他的传世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信史”,这全赖于他的求真精神。对此,波里比阿说得更形象,他把“真实”比喻为人之双目,说历史失去了它,岂不成了取悦读者的谎言。于是,他认识到,求真乃史家之第一要务,历史学家必须抛弃一切个人的成见和党同伐异的情绪,以公正的态度,从大量的史实中求得正确的结论。^②近代英国史家柏立在《古代希腊历史学家》一书中指出:“希腊人虽不是记录人类史实的第一人,却是批判史实的第一人。换句话说,他们首创了史学。”^③是的,古代东方诸国开始历史记录的时间要远早于古希腊。公元前三千年代,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等古老的东方奴隶制国家就出现过“年代记”一类的历史记载了。保留在《旧约全书》中的古代犹太人的历史记录也较希腊人为早。但这些记载良莠不分而难以分辨真伪,只能说是一些“实录”。古希腊人则不然,他们虽步古代东方人之后,但在史学上却确立了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亦即求真探索的精神。对于大多数古希腊史家来说,他们并不以记录历史事件为满足,而是致力于探究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历史表象后面的深层原因。不是吗?在古希腊语里,“历史”一词的含义就是通过考问、探究所获得的真知,而非真伪莫辨的“实录”。古希腊历史学家这种在史学上的求真探索的精神,不仅为古罗马史家及后世史家所继承,而且也为西方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 人文主义观念

西方文明的出发点是人,史学亦然。早在西方上古的一些神话传说中,就不乏有先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18页。

② 波里比阿:《通史》第1卷,第4节。

③ 载《古代希腊史研究论集》,台湾1979年版,第103页。

民对人的问题的最初思考，刻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石碑上的“认识你自己”这一箴言，就分明地昭示世人，古希腊人对人的自身地位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在公元前5世纪发生的希波战争中，古希腊的一些弹丸之邦结为一体终于击败了波斯帝国的倾国之师，这就使人们觉察到拯救希腊的是人而非神，而这也正是希罗多德《历史》所要表达的主题。修昔底德更着意评价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常常借他人之口宣称：“人是第一重要的，其它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①罗马史学后来虽然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但在圣·奥古斯丁之前，基督教的神学史观还未确立，从李维到塔西陀，罗马史学所反映出来的不是神事，而是人事。正如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指出，希腊罗马史学作为一个整体，它的特征之一是人文主义的，“它是人类历史的叙述，是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②虽则中世纪的西方史学一度沦为神学的附庸，但走出中世纪之后的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实际上是古希腊罗马史学中的人文主义观念的“复兴”，史学“又一次地把人放在它的画面上的中心地位”^③可见，古典史学的人文精神虽有中断，但在文艺复兴时代及以后却有着更大的发展。

3. 宽宏的历史眼光

在有代表性的西方古典史家那里，这种宽宏的历史视野有着很充分的反映，尤其在那些撰述“世界史”或“通史体例”的史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我以为，如果不拘泥于“世界史”这个概念现代含义的话，那么，希罗多德写的《历史》，事实上就是他那个时代希腊人所知的“世界史”，一部古希腊人所闻知或探访过的古代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通志”。波里比阿写作《通史》，更具有世界主义的眼光，他所记载的不只是罗马人的历史，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世界史”。在他的《通史》中，波里比阿试图寻求世界历史的有机联系以及历史变动的整体性，因而他被学界视为撰述世界性历史的创始者。波里比阿的宏观视野标志着这一时代西方古典史学的重大进展。此后，在西方古典史家中继续尝试写世界史的还有波息多尼阿、狄奥多洛斯等人。李维的《罗马史》写的是罗马自建城以来迄至奥古斯都时代晚期历史的罗马兴衰史，堪称为一部综合性的通史之作。他的历史视界是相当辽阔的。此外，即使是一些专史作家，由于受其题材所限，虽不及通史作者那样具有恢宏之势，但他们的历史视界也是颇为宽广的。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是一部典型的专史，但作者却独具慧眼，把绵亘27年、中经议和间歇、又分散在几个相去辽远的地区爆发的战争，视为一次首尾连贯的历史事件，这同样说明他具有敏锐的和宽廓的历史眼光。由此可见，倘若写作专史的人，没有整体观念与宏观视野，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历史学家。其后，大凡西方史家成功的史学实践也都证明了西方古典史学这一优良传统之可贵。

4. 注重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

希罗多德在《历史》一开篇就说：“他之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06页。

② 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③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65页。

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①显然这是注重史学的社会功能。历来被西方史家誉为“客观主义者”的修昔底德之所以写战史，显然也完全是有为而发的。他的书“并非为要誉于一时而作，而是为了垂鉴于永久。”^②因此“这部书既是历史，同时又隐然是关于雅典城邦安危兴废的政论。”^③“隐然”也者，指的是修昔底德所刻意营造的那种只有他才有的冷静史笔罢了，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写作这部战史用来训诫后世的真实意图。这一点，波里比阿比他的前辈史家提得更为明确。在他看来，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训的哲学，它不仅使人们能从中获取广博的知识，而且应当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他之“求真”，在求“实用”，并笃信这是史家之天职。这种传统更是被后来的罗马史家继承与发扬了。罗马史学始祖老伽图就深信历史的目的在于劝善惩恶，在萨拉斯特、李维、塔西陀“罗马三大史家”那里更是如此。如李维，他之所以撰《罗马史》，意在通过赞颂先辈创业之艰难，激励当代罗马人的爱国热忱，以找到未来行动的方向。他对历史的垂训作用的强调，着眼于整个罗马国家的存亡继绝，其立意与视野是较高的。而在塔西陀那里，似有一种把历史的垂训作用与道德教育作用相结合的趋向。如他在其名著《编年史》中这样写道：“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把后世的责难，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④他的确是意存劝诫而褒贬分明的，他的著作无不充溢着反对暴政与歌颂共和的主旨，以致其作成为后世“惩罚暴君们的鞭子”（普希金语）。

5. 重视史著的文字表述与史家的自身修养

希罗多德之所以被西方称作“史学之父”，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不仅首创了日后成为西方史坛编纂历史的正宗体裁——叙述体，而且还具有卓越的编史才能，正是他把历史的真实性与编纂的艺术性成功地结合起来，教会西方人应当如何去编撰历史。他的《历史》行文流畅可颂而有韵致，被誉为用散文写成的史诗。他是不愧为“史学之父”这一桂冠的。修昔底德则代表着另一种撰史风格，其特点是文笔冷峻，文字表述简洁凝练，遣词造句，无不精益求精。由此看来，西方古典史家不仅在内容方面而且在文字表述方面也形成了两种风格：希罗多德的丰赡华丽与修昔底德的严谨练达。我以为，这两种撰史风格，是互为补充的两种史家之长，不仅不应互相对立，而且是应该并行不悖的。后起的罗马史家确也各有所崇，李维留有希罗多德之风韵，文词华美，描写逼真，英国诗人拜伦称之为“李维的历史著作像是生动的画卷”；塔西陀步修昔底德之后尘，著史以文约事丰与言简意远而享誉后世。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在罗马统治时期的古希腊作家卢奇安（一译疏善，约125—约192年），他在《论撰史》^⑤一文中提出：理想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两种才能：政

① 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② 吴于廑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2页。

③ 同上，第95页。

④ 塔西陀：《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5页。本处引文据丘奇等英译本有改动。

⑤ 卢奇安：《论撰史》，中译文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以次。

治眼光与表现才能,前者指的是历史学家对社会历史的器识,后者指的是史家撰史的文化素养;他认为历史学家应当是文章高手,既不任意渲染,夸大其事,又能恰如其分,生动地、准确地把自己要著述的内容表现出来;他倡导“襟怀坦诚”与“如实叙述”,厌弃欺世媚俗与粗疏无据的文风,认为史家撰史只服从真理,而绝不屈服于神灵或显贵。这篇仅万字且采用书信体的文字,实际上对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西方古典史学,特别是对它的优良传统作出了很好的概括。如果说众多的希腊罗马史家对史家的主体意识与自身修养还只是通过他们的史学作品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话,那么卢奇安则首次从理论上对此以及史学的其他重要方面作出了深刻的思考,不啻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篇出色的史论,至今仍不失其理论的光彩。

二

正如本文在引言中就指出过的,中西史学的直接交汇大体不会早于19世纪晚期。一般说来,中国历史学家接触西方的历史学说,较之西方的社会学说、政治学说乃至哲学学说等要晚,如梁启超在写作《新史学》时,主要摄入的是后几者,而对西方史学所知不多。说到西方史学之输入中国,最初的渠道大多是借助日本的间接介绍,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引进西学方面走在中国的前面。从上一世纪末,中国学者通过日本学者的著译,开始向国人介绍近代西方史学的一鳞半爪,直至本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才开始稍具规模地引入我国^①。因此,中国历史学家接触西方史学,首先吸纳的是西方近代史家及其史学思想,诸如近代欧洲的兰克、巴克尔、格林、伯伦汉、瑟诺博斯等人。在20—30年代中国引进西方史学的热潮中,依然是近现代的欧美史学为主,在那时对中国史坛发生真正影响的主要是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现代美国新史学派以及德国兰克学派的史学思想。

西方古典史学,最早于何时并由何种途径输入中国,对此我们还不甚清楚,还有待继续查考。但是,根据我们已获知的若干材料,西方古典史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坛,也引发了最初的回响,虽则这种回响是那样的微弱。1920年,李大钊开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前者谈论是全是近代西方的历史思想,后者只是在“什么是历史”一节中提到了希罗多德的名字,但语焉不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于1923年11月29日在上海大学的讲演中称:“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历史的任务的是希罗陀德。”^②他在论及什么是历史学家的任务时还说道,“希罗陀德(Herodotus)已经告诉过我们:一应当整理记录,寻出真确的事实;二应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③在这里,李大钊把希罗多德与马克思

① 参看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②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8页。

③ 同上,第675页。

并提,这可约略看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西方古典史家的评估与了解的程度。

这种反应还可从 30-40 年代我国学者编撰的若干史学概论的一类作品中略见一斑。卢绍稷的《史学概要》^①一书,有专章介绍“西洋史学”,在“西洋史学大要”一节中,陈述西方史学的萌芽与古希腊罗马史学的发展情况,并一一列出了西方古典史家及其代表作的名称,偶有点评,如说希罗多德“过尚文采,难免失真”^②,称修昔底德之书为“教训式历史”,称波里比阿的史学成就“实为希腊史学之后劲”,称李维“具有历史之天才”,称塔西陀“尤富史识”,称“罗马人重尚实际,其在史学上之成就似不逮希腊”。考察当时的情况,卢氏对西方古典史学的知识恐怕大多来自现代美国新史学派的作品,如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一类的书。胡秋原在《历史哲学概论》^③一书中,亦列有西方史学史专节,介绍了西方古典史学的一般情况。在 40 年代出版的常乃德的《历史哲学论丛》^④与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⑤等书中亦有一些反映。但给人们总的印象是,这些介绍是简要的、不全面的,遑论深入的探索与具体的研究了。

这一情况,在 50 年代之后的新中国史坛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西方古典史学名著的译介。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书均在 50 年代末与 60 年代初出版了,稍后由吴于廑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在 1962 年开始分册陆续出版,其书对西方古典史家的名著所选篇目尤多。此外,60 年代初一度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史学史热”,各高等院校历史系重视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直至“文革”来临,这些工作才被迫中辍。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前极左思潮的影响与笼统排斥外来文化的时代氛围中,仍有一些比较深入探讨西方史学的论文见世,如齐思和的《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⑥、吴于廑的《论西方古今的两个“客观”史学家》^⑦。齐文不仅对欧洲史学的发展进程及其特点作了探索,而且对中西古代史学的异同作出了中国史坛上的最初的比较研究。吴文把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与奉前者为祖师的近代德国史家兰克对照起来写,虽落笔留有当时的时代痕迹,但我以为迄今仍不失为一篇颇有深度的研究修昔底德与兰克史学的论文。

然而,从新中国成立迄至“文革”的 17 年中,就中国的西方史学来说,总的还处于停滞状态,西方古典史学的研究亦然。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后的 15 年里,我国的西方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西方古典史学也在中国激起了更广泛的回响,一种对西方古典史学沟通与回应兼备的史学上的巨大的反响,具体可论列如下:

1. 全面译介西方古典史学名著

① 商务印书馆,1930 年出版。

② 卢绍稷:《史学概要》,第 3 章第 1 节。接下 5 处引文不注者,均见该书第 3 章第 1 节。

③ 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建国印书馆印行。

④ 商务印书馆,1944 年初版,1947 年重版。

⑤ 独立出版社 1945 年出版。

⑥ 载《文史哲》1962 年第 3 期。

⑦ 载《江汉学报》1963 年第 6 期。

在我国新时期出版的西方史学原著中,其中以古典史学名著最为齐全,迄今大部分的古希腊罗马史家的代表作都有了中文版,除重版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塔西陀的《阿古利可拉传》与《日耳曼尼亚志》等书外,另有有色诺芬的《长征记》、凯撒的《高卢战记》与《内战记》、阿匹安的《罗马史》(上下卷)、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李维的《罗马史》(选本)、塔西陀的《历史》与《编年史》等等。这一“基础工程”,为西方古典史学的深入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2. 全面介绍西方古典史学

80年代伊始,郭圣铭率先发表了《古希腊的史学遗产》一文^①,揭开了新时期中国学者全面介绍西方古典史学的序幕。仅就1981至1983年这3年的粗略统计,述论西方古典史家的文章就有20多篇。此后,在郭圣铭的《西方史学史概要》^②、张广智的《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③等多种由我国学者撰写的西方史学史的著作中,都有专门叙述西方古典史学的章节。1986年,吴于廑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上卷)的合订本出版^④。同年,刘明翰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介》(第一卷)亦见市^⑤。次年,英国学者汉默顿编的《西方名著提要》(历史学部分)的修订本也面世^⑥。这三本由中外学者编撰的书,悉数收录西方古典史家的代表作及对它的评价,可使读者获得对西方古典史学名著全貌的了解,并可以此作为入门的途径。介绍的面也铺得很开,这更是本世纪以来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3. 开始作深入的研究

新时期的时代条件与学术环境,使我国的西方史学史家的视界得到了拓宽。他们试图用一种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包括古典史学在内的全部西方史学,因而对“文革”前西方古典史家评价中的一些不确之词作出了新的评估,如对修昔底德历史观的评论、对塔西陀史学贡献的评议等。另外,对西方古典史家的个案研究,如对希罗多德史学的研究,无论是他的史学思想还是史学方法,总的看来是较往昔深入了一步。十多年来发表的这方面的论文,不仅数量可观,亦不乏有上乘之作。

在西方古典史学的研究中,最能体现中国学者视界拓宽并开始作深入研究的是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比较史学因当代史学的国际化而得以兴起与发展。在中国史坛,史学的比较研究虽然过去也有,但现代意义上的比较史学的勃兴却是随着新时期引进的众多的西方史学新方法的伴生物。注意到这一学术背景,我们在考察中国的西方古典史学研究的情况时,就会徒增新意,多少感受到当代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潮流的遥相呼应以及中国当代新史学逐步走向世界的可喜进步。

① 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4期。

②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③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④ 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

⑤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⑥ 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

关于中西古代史学微观的(个别史家)的比较研究,最有成果的当表现在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的比较研究上。早在1956年,齐思和就在《〈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一文中^①,从中国史学的角度主张应对司马迁与希罗多德的著作加以比较,惜齐氏在此文及以后的论著中未及详加阐发,他的这一识见及方法直到中国的新时期才有了积极的响应。时隔25年之后,笔者在《希罗多德:西方史学的创立者》^②一文中,从西方史学的角度,主张应对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的史学加以比较,并认为:“如果对这两位史学巨人作一番比较研究,一定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史学发展的规律性。”^③据知,这一工作在海外的中国学者中,已有不少成果面世。如邓嗣禹已发表《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之比较》一文^④,从两者时代背景与传记、作史的动机与目的、史书之组织范围、史学方法与史观、优点与缺点等方面作了详尽的比较。又如,侨居巴黎的左景权(左宗棠后人)已出版《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的比较研究》专著(法文版)。在该书序言中,左氏特为指出:如果西方史家认定希罗多德高于司马迁,那么请他们用一种西方文字写书来证明,就如同他一个中国人用法文写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一样。他的这一挑战,至今仍未见有哪一个西方史家敢于接受。有趣的是,却有中国学者写书来论证司马迁高于希罗多德,如二年前出版的黄新亚著的《司马迁评传》,在“东方与西方”这一节中,作者对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作了专门的比较后得出了司马迁大大领先于希罗多德的结论,并指出:“希罗多德的《历史》仅仅包含了我们所说的历史科学的因素,而司马迁的《史记》却奠定了中国历史科学的基础,也奠定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科学的基础。”^⑤

近年来,在我国大陆学术界刊出的这方面的论文也不少,如有:林青、蒋颖贤的《希罗多德和司马迁》^⑥、杨俊明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与司马迁之比较研究》^⑦、晓明的《〈史记〉、〈历史〉比较论》^⑧等文。我以为,此类中西方史家的个案的比较研究,还应扩充选题,而不只限于这两位东西方的“史学之父”,即便是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的比较研究,也应加强力度,以期新的突破。

对中西古代史学作出综合性的比较研究,较早的有王晴佳的《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的比较试析》^⑨,王文后又见有陈剩勇的《论中西古代史学的差异及其特征》^⑩、陈建平

① 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

② 载《复旦学报》1981年第1期。

③ 载《复旦学报》1981年第1期。

④ 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期(上册),1956年。

⑤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249页。

⑥ 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⑦ 载《求索》(长沙)1991年第1期。

⑧ 载《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2年第3期。

⑨ 载《社会科学》(上海)1984年第8期。

⑩ 载《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6期。

的《中西史学异同论》^①等。1992年新创刊的《史学理论研究》(季刊),在第2、3期连载有朱本源的长文《〈诗〉亡然后〈春秋〉作论》,朱氏用现代的史学理论,解读孟子的“《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命题,释论中处处贯彻了“比较历史学的观点”(与西方古代史学相比),有力地说明孟子在论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性质时所表现出的高度的理论思维,并论证了孔子是中国的科学历史学的奠基人——中国历史之父。这确是一篇值得我们重视的东西方史学比较研究的宏文。该刊第4期载有胡逢祥的《中西史学源起比较论》,也是一篇着力探讨中西史学的源起过程及其早期史学观念的综论。总之,这类综合研究,需要有一种宏观的视野,需要在一个历时性的考察中对两种异质的史学文化作出跨越中外的共时性的比较研究。这是颇具魅力而又有相当难度的学术课题,中国学者已经做出的一些成果无疑为后来者的继续求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进而言之,西方古典史学的优良传统对中国历史学家已经并将会继续产生巨大的和无形的影响。笔者随意翻阅案头一本新到的杂志,以下的几行文字立即跳入了我的眼帘:“史学家的本体精神或自觉意识,其核心就是求真。”“唯有真实的,才是有价值的。这个命题,对历史学来说尤为重要。真实是历史学的生命。”^②这一思想乃至措词,与西方古典史家何其相似乃尔,真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历史学家对西方古典史学所产生的一种回应,一种超越时空的古今历史学家心灵之间的感应。

三

西方古典史学既是古老的,但又是常青的。说它“古老”,因为它起源于遥远的西方上古时代,距今已将近有三千年,在世界史学史上,也可称得上是有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说它“常青”,是说它的传统的赓继与变移。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说:“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域,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③在他看来,传统并不仅是一种现成之物供人继承,它的进程也包含着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参与,所以理解者和解释者的自身也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因此,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一方面由于世代历史家的继承与发扬,总是处于不断的运动中;另一方面在这过程中,又融合了历史学家对这种传统的理解与诠释(制约、消融乃至改造传统),进而形成为新的传统。因而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变动不居的,它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常青不谢,不断演进。

所以,我们需要让传统向现代转化,需要寻求西方古典史学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古

① 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

② 此文为路新生撰,题为《史学现代化与史家主体意识的觉醒》,载《探索与争鸣》1993年第4期。

③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页。

典史家的作品,为现代人了解人类社会的过去,尤为历史学家研究往昔的历史提供了条件,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同样,对更多的读者来说,他们欣赏古典史家作品之优美,音调之铿锵,故事之动人,把这些作品当作希腊文拉丁文的范文来诵读,古典史家作品的文学价值在当代确不失其魅力,这同样是毋庸置疑的。但令人置疑的是,这些就是它与现代世界交融中的全部价值吗?显然不是。我以为,从本文第一节所一再列举的西方著名史家及其代表作来看,西方古典史学所反映出来的以真为要的探索精神、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以史明智的鉴诫精神,其现代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它不仅对后世的历史学家来说具有摄纳与借鉴的学术的、现实的价值,而且对敦化与启迪当代人的心智也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此外,这些精神经过历代史家的传承、演绎与发展,已日渐融合在西方社会的集体意识中,并进而成为影响西方社会发展的深远的历史传统,而这无疑与西方古典史学的优良传统是相观照的。历来的研究者只致力于从西方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去探究西方社会的历史传统,而往往忽略从历史学自身这一视角去观察与认识这一点,这终究是一种缺憾,因为在这里,研究者们恰恰忽略了西方古典史学所包含的现代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当代西方史学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高视阔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战后的新史学思潮尤为汹涌澎湃,至本世纪70年代达于极盛,进而演化为西方史学的主潮。然而,当代西方新史学终由繁茂步入误区而陷于困境。如新史学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广泛“结盟”,于是历史研究日趋细微而演化为支离破碎的钁钉之学,有人称之为“被砸得粉碎的历史学”;又如,新史学成果表述的数理模式化,使广大读者对这样的“历史著作”望而却步,克丽奥(历史女神)已失去了昔日的魅力,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具体分析当代西方史学进程中所出现的这种种现象,不是本文的任务^①。不过,就我看来,当代西方史学之所以步入误区,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西方古典史学优良传统的偏离,如以上举二例而言,前例所显示的“史学碎化”,实际上是背弃了西方古典史学一创立就含有的总体史的编撰传统;后例则是背离了西方古典史学中的叙事史传统,而这正如美国史家汤普逊所说:“叙事史是最古老的一种历史。虽然历史科学已经提出更高的问题,但这种叙事史永远不会被废弃,永远不会死亡。”^②确是这样,80年代的西方史学不又出现了“叙事史复兴”的现象吗?因此,我以为提出“回到古典史学,发展古典史学”这一命题在当前是有积极意义的。换言之,这一口号实际上是要求历史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弘扬古典史学的优良传统,这对当代西方史学走出误区虽不是唯一的,但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现当代西方史学的成长是离不开古典史学的哺育的。

(下接第26页)

① 对此,晚近以来国内学术界已有一些文章谈到,如陈启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载《史学理论丛书》:《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启能:《从“叙事史”的复兴看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载《史学理论丛书》:《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庞卓恒:《当代西方史学的进展和困惑》,同上书。

② J.W.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0页。

实际问题。例如 70 年代中,《世界上古史纲》根据历史唯物论,总结了世界人类学的成果,认为存在着一个从猿到人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生物是正在形成中的人,只能使用天然工具而不会制造工具;工具的制造标志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即使现在看来,这个理论也还是完全正确的。从分子生物学及化石材料上看,人和猿的分离时间是 1000 万至 500 万年前,而人(Homo)的出现及石器的产生,都是在 240 万年左右。也就是说人和猿分离之后,并不是立即成为人,更不会制造工具,这里有着漫长的过渡时期。但许多同志不是从实际材料出发,而是根据马恩的片言只语反对《世界上古史纲》的观点。^①这种文字游戏式的反对意见不仅不符合马恩原意(对此,毛昭晰先生已有论述),^②同时也无助于实际研究,只会造成许多混乱。

恩格斯时代,现代科学刚刚开始建立,对人类起源的实际过程几乎无所知晓。如恩格斯引用说,地球的年龄是一亿多年,^③但我们现在知道的地球年龄已有 46 亿年了。在生物学上,上个世纪仅仅是外部形态的宏观研究,现在已发展到分子水平的研究,上个世纪对古人类化石所知极少,现在我们不仅发现了十分丰富的化石及文物,而且知道了人类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不同的阶段(即不同的种)。因此,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现代科学来研究人类起源问题,而不能用前人的认识将自己困死。用经院式的哲学争论取代具体的实际研究、用过去的结论解释现代的事实,这都是无助于科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科学之上的,科学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本文作者龚缨晏,1961 年生,杭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① 卢文中:《关于人类起源的几个问题》,《吉林师大学报》,1978 年,第 2 期。王海林:《“正在形成中的人”与“劳动”》,《史前研究》,1985 年,第 1 期。

② 毛昭晰:《蒙昧时代低级阶段是从猿到人的过渡时期》,《世界历史》,1983 年第 3 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12 页注。

(上接第 72 页)当今中国的历史学正处于重大变革的转型时期,为了促进我国史学的现代化,我们当然需要自身的努力,但也需要接受外界的挑战与推动,这就需要引进域外的史学,引进包括古典史学在内的西方史学,使之成为推进我国史学现代化的一种助力。西方古典史学的现代价值,一方面取决于它本身所包含的财富,另一方面又取决于现代人而主要是当代历史学家对其全部史学遗产所持的积极扬弃与批判继承。因此,西方古典史学也需要得到现代意义上的研究与总结,还需要得到中国学者的解说与释论,使外来与本位融合,唯其如此,才能把西方古典史学的优良传统与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并加以发扬光大,而这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很艰巨的任务。

(本文作者张广智,1939 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